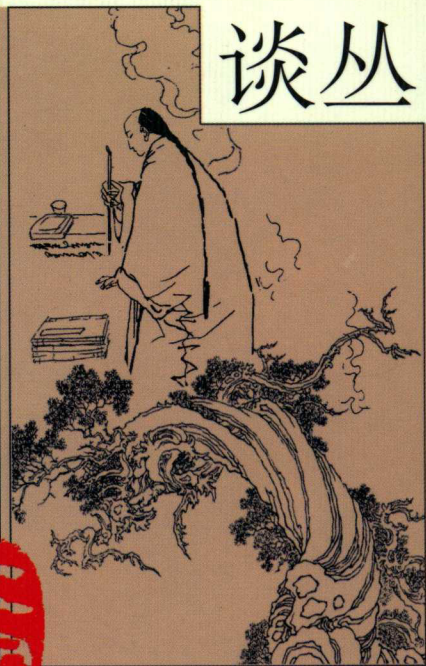


# 史 笔 丛 谈

黄裳

著

北京出版社



小  
书

大 家 写 给 大 家 看 的 书

# 笔祸史谈丛

黄裳 著

北京出版社



小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笔祸史谈丛/黄裳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3  
(大家小书·第3辑)

ISBN 7-200-05030-X

I. 笔... II. 黄... III. 文字狱—中国—明清  
时代—文集 IV. K248.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077126号

·大家小书·

**笔祸史谈丛**

BIHUOSHI TANCONG

黄 裳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燕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开本 4.5印张 80千字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200-05030-X

I·796 定价: 8.00元

##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



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 再论再论说真话（代序）

黄宗江

欣悉老友黄裳旧作《笔祸史谈丛》即将新刊。黄裳最擅旧书新读、旧戏新谈、旧史新论；这是因为他最善于掌握这旧与新的关系，也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亦千古至今做学问的契机。我又奉命当之序，既感荣幸，又感惶恐，尤恐又祸从笔出也。猛想起我十几年前就发过一篇杂感，正从他的“笔祸史”谈起，如今也难再说得更加真切，索性就旧文新发于下以代序。

夜半，偶得半题：人贵在说真话之类；其实这类题目早就有人作而又作了，巴金师以说真话为题就写过了一论二论三论……我再用之，亦非出于偶然。深思之，自己在“文革”后所写作品几乎都与此一主题有关，也可以说是当代一大“中心主题”了。以此念告老伴，她却说：“别说了，别写了。”并向我出示当日《人民日报》9月19日8版所载评介我老友黄裳著《笔祸史谈丛》的文章，并要我细读。其实黄裳早就赠我此



书，我早就通读，甚至不读也通的。我懂得这一部笔祸史是一部文人的血泪史，一部断头史；但历朝历代的文人也不是不晓利害的，却偏偏仍常有人把头颅送上。我是不想这样死的，我也知道今天——“文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今天是不会这样死去的。当然，又得说真话，还不是毫无余悸，毫无客主观使然的杂念的。我仍在老伴前叨叨不休，甚至想把这些私房话公之于世。

近日在上海《文学报》上见到一篇《黄宗江依然不忘张志新》短短数百字的报道，大致说我在张志新文革中说了真话遭致割喉再枪决案公布后，写了电影剧本，好几位导演欲拍未遂，虽亦无人公开反对云云。又道我引申地说了巴金倡建“文革”博物馆，邵燕祥倡建“文革”学，以使国人不忘教训，亦均未能有所建，这些还是由于有些人怕提“文革”，不愿彻底否定“文革”云云。现在已经久卧病榻说不出话来了的周扬同志说过：张志新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共产党人，她胸中既有三且有四——三者三中全会，四者四个坚持，而这三和四她都无幸赶上，然而她却具备这可以合二为一的精神了。她在那恐怖的万家墨面的年月就说过：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不容否认，但他晚年犯了斯大林式的错误……等等，等等。后人愿意重提“文革”，重提张志新，也还

是想借助敢说直话的张志新的亡灵或招魂或打鬼也。

俱往矣！千古多少令人爱煞敬煞的人物，粗直如张飞、李逵……斯文如屈原、司马迁、李贽、鲁迅、巴金……均贵在其真；千古多少文章如离骚、史记、鲁迅杂文……无不贵在其真。真不一定就对，然必须首先出之以真，方能见其可否。其未必就是真理，然真理必真。有理有利有节固好，但直言无讳的时刻哪又顾得了这许多？顾多了也就可能真不了啦！文人如无真则是最大的无行。政治家如弄假愚民则是骗子，且是骗子中最大的骗子，即政治骗子！

关于民主自由的定义，当也有百家说法，绝非仅是两家。可否也一句白话以蔽之曰：能让百姓说真话，也就实现民主自由了，也就反而能够真正地国泰民安了。

行文至此，了无风华，老生常谈耳；但我相信还会有多少位老生小旦百论千论说真话。在这一点上，我是乐观的，又不尽然，乐乎悲乎，且观之。停笔矣，乃又想到老伴，她从来是我的第一读者，这一回给不给她先看呢？……还是给她看了，沉默未语，但也不像是要和我划清界限的样子，我也就不怕，照发。



## 目次

雍正与吕留良 .....	(1)
“名教罪人” .....	(13)
宽严之间 .....	(19)
隔膜及其他 .....	(32)
“几乎无事的悲剧” .....	(38)
违碍种种 .....	(46)
避讳的故事 .....	(55)
清代的禁书 .....	(62)
禁书小记 .....	(72)
《南山集偶钞》 .....	(73)
《峤雅》 .....	(79)
经钜堂文稿杂著 .....	(82)
《国史纪闻》《嘉靖以来注略》 .....	(85)
《秋水集》 .....	(90)
查·陆·范 .....	(94)
“光棍”的诗集 .....	(102)
汪景祺遗诗	
——跋《读书堂诗集》稿本 .....	(111)
谈禁书 .....	(117)
后记 .....	(127)

## 雍正与吕留良

清朝的文字狱，一般的意见都以为到了乾隆时才盛行，自然，以数量而论是如此。九辑《文字狱档》差不多有八辑都是说的乾隆一朝事。但以质量论，却都远不及雍正中发生的曾静吕留良案之重要。雍正的处理方法也是很独特的。一般的逆案，犯人的言论总是干碍着皇朝的体统与机密的，即使在官文书中有所触及，也大抵一鳞片爪，语焉不详，因为这都是“防扩散材料”，不宜使大众知道。可是雍正却反其道而行之，决心将这些材料公布于众。对于案犯的处理，常例是由大臣们审讯定拟，奏请皇帝批准执行，但雍正又一反常规，自己站出来与案犯面对面地辩论，写下长篇的上谕，为自己的政策、言行作辩护。对于这类大逆的案犯，照例是要凌迟处死的，但雍正又一反旧例，并不杀掉，还要罪犯到处讲说，现身说法，宣扬政策，而且告诫子孙，永远不得杀害，这又是石破天惊的做法，为一切人所不及料。但这最后一着却终于失败了。雍正一死，嗣皇帝乾隆就立刻处死了案犯，并且将雍正颁布天下的《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下令销毁。乾隆为这一翻案活动找到的理由是：



“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到底也没有说得明白，但从皇帝一换，政策立刻就变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雍正确有点特别的地方，不大像人们心目中的皇帝模样，作为一种别格，不能不说是难能而可贵的了。

关于曾静一案处理的另一破格之处是宽恕了现行的曾静而狠狠地惩办了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及其子孙亲属。雍正自己的解释是，如不经曾静投书，“则谣言流布，朕何由知之，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在曾静亦未为无功”，而吕留良则“谤议及于皇考”，是不能宽恕的。这解释不用说也是支离的，就连他给亲近的大臣的朱批中，也不能不承认是一种“出奇料理”。其实他是看出了思想上的叛逆比具体行动尤为危险的。而要彻底清除思想上叛逆的根源，不能不抓住一个有代表性的靶子来大做文章。吕留良搞过结社讲学，又大量批点时文，在读书人中有颇高的声望，又正好碰到刀口上，被他抓住了。他的这一思想被乾隆接受，贯彻下去，就成了此后办理文字狱的原则基调，也是通盘政策由武力镇压转向思想统治的契机。而雍正则是它的奠基者。

《大义觉迷录》四卷，现有重印本。所据底本有雍正内府刻本与雍正刻本两种，前者是御制的原本，后者则是地方上的翻刻。当日既要使之“家喻户晓”，

那翻刻就不只一种两种，印数也必然可观。但被乾隆宣布为禁书之后就变成罕见本，成了藏书家的宝贝。本来是人人必读的政治教科书，转眼竟成为“防扩散材料”。在浩瀚的禁书目中，因此而出现了仅有的一种本朝皇帝的御制国书。凡此种种，都增添了它的神秘性。但要了解曾静一案的真实情况，它却不及文字狱档中所收材料之原始而可信，它略去了案件发生初期种种有趣的事实，曾静的口供虽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内容千篇一律，都是按照雍正的口径进行的自我批判，口口声声“罪该万死”，与“文革”中中国知识分子差不多都写过的交代和思想汇报没有什么两样了。这一切又都经过御览，整理修饰，成为典型的认罪八股，看起来只能使人昏昏欲睡了。

此案的透露是“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向陕西总督岳锺琪上书，这时曾静和张熙用的还是化名，投书的封面上写的是“天吏元帅”，书中“且谓臣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踞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从岳锺琪的奏折中透露的零散材料，可以知道投书大致内容是反清复明和攻击雍正的种种失德。雍正的反应则是故作镇静，声称“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同时指出岳锺琪的秘审、用刑是“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还替岳设计了诱供的手段、言词。岳锺琪照办了，对张倬予以优待还“与之盟誓，伪为激切之言”，这样，



张倬果然上了圈套，供出了真实姓名居址和一切关系人。雍正满意极了，肯定了岳的做法，朱批说：“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这种灌米汤手法是雍正的拿手好戏，对年羹尧早已使用过了，它也真的有效，立即使岳锺琪“感泣悚惶，惊喜交迫”。雍正又有朱批云：“朕生平居心行事，惟一诚实二字。凡谕卿之旨，少有心口相异处，天祖必殛之。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夕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五内欣悦览之。”为了收买臣下的忠心，不惜赌咒设誓，这在历代皇帝身上也是少见的表现，但恰好反映了君臣之间的猜疑、危惧。岳锺琪的审问张熙，一定要拉一个满洲大员陪同，也是为了撇清嫌疑。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之间的矛盾与合流，在这里是表现得如火如荼，好看极了。

曾静给岳锺琪的原信一直没有发表过。开始时岳锺琪是不敢冒昧呈览的，因为内容实在太露骨了，但雍正却说，“犬吠兽啼之声耳，有何可介意，送来闲览之”。态度似乎颇为从容，但当他看到原件之后，却不能不惊呼：“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这确是由衷之言。他又庆幸曾静、张熙的自首是一件好事，并表示“此书一

无可隐讳处，事情明白后，朕另有谕”。这是下决心作“出奇料理”的开始。雍正经过明察暗访，知道“逆书”中指斥的情节，并非出于投书者自己的捏造，而是流布已经十分广远的公论，加以掩饰将是毫无意义的。他分明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即使是在封建社会里，舆论自也有它的力量，这正是一个好例。按照惯例，曾静也将雍正的罪恶归结为十条：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具体内容从雍正自己的辩护词中可以约略窥见，这是清初著名的公案，有不少学者都曾加以考证论定了。总之，这里说的是雍正做皇帝是否够格的问题，到底还是次要的。《大义觉迷录》中所载第一道上谕的主要内容则是有关夷夏之防的辩论。

雍正说：“在逆贼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人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盛德乎？”

他把少数民族的问题说成是籍贯问题，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但今天看来，这已完全不成问题，而且他的说法也含有不少合理的成分了。何况他也并未完全回避异民族的事实。“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拒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骂乎，骂人乎？”这里



就坦率地承认了自己是“外夷”，哓哓争论，有如小孩的相骂，这样的上谕也是少见的。

雍正又推论华夷之论，盖起于晋宋六朝偏安之时，还指出中国幅员的拓展与民族融合的事实，也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獯豸，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这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雍正还举出了圣经贤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说明只有有德者才有资格做皇帝，民族、地域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这样，就接下去顺理成章地辩解自己实在是个够格的好皇帝，并非曾静所说的昏恶了。当然还免不了指天发誓，为了杜绝流言的影响，“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看来他的处理此案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的。“倘朕言有一字虚捏……必遭上天之责罚也。”“挥泪书此”这些话都说明他确是感到了反对派的强大与自己的孤立与无力，不能不说出这些极话来了。

岳鍾琪在审问张熙时曾盘问“平日往来相与之入并其所祖述师承之具”，据供，“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

者，系吕晚村，号东海夫子。我曾亲到其家，见其所著《备忘录》并《吕子文集》。惜其子孙不肖，忽背先志，贪慕荣利，已作仕宦，可为痛恨。今行李中所有抄录诗册，即晚村作也”。这是此案牵涉到吕晚村并引起雍正注意的开始。所说不肖子孙是指吕留良子、考中进士的吕葆中，此时亦已死去。文集是指《吕晚村文集》，雍正初刻本。晚村诗集没有旧刻，只留下一些传抄本，张熙所抄大抵就是这一类。

《大义觉迷录》卷四差不多就是批判吕留良的专卷。方法是首先打掉吕留良明遗民的头衔。清朝对待明遗民的态度是既防范也尊重的。固然希望他们出来为清朝帮忙，可是对真的降顺过来的又加以鄙视，修“二臣传”就是一种表示。这种看来似乎有点矛盾的现象只能用封建道德标准的忠字来解释。统治者需要的是死心塌地的忠顺奴才，恨的是反复无常见风使舵的角色。二臣既然背叛了前朝，那就不可能是新朝的可靠帮手。为了统治者的利益，是不能不表彰前朝的孤忠，正是为了效力新朝的榜样。清初的隆重为明遗臣赐谥予祭，做的就是这个题目。也就是说，主子虽然换了，奴才固有忠的道德是不能变的。而吕留良却是考中过清朝的秀才的，一入黉门，君臣之分就定了，再行反复就将不齿于士类。雍正说，吕留良“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乃于康熙六年，





因考校失利，妄为大言，弃去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宏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荐，则剃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

雍正接下去又对吕留良著作中的“悖逆狂噬之词”举例加以批驳。雍正当日接触的吕留良著作，除日记已经消失外，文集还留下了雍正初南阳讲习堂原刻的《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续集四卷，后附“男公忠谨述”的《行略》。少加比勘，就知道雍正当日是颇为细心地通读了原书的，也确能摘出一些反映作者思想的词句。如文集中“德祐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又云“将以小庄为桃花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人”等等，其实这样的词句在文集中是所在多有的。文集卷五有“秋崖族兄六十寿序”一文，看题目大约是不会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的，然而不然，文章一开头就说去常熟为钱牧斋庆祝八十寿辰的事。这钱牧斋就不是清的统治者喜欢的人，他自己的著作全部被禁且不说，任何文字只要牵涉到钱的名姓议论，也得一律抽毁。钱牧斋对吕留良说的一段话更是皮里阳秋、意在言外，他说，你算了吧，要为我祝寿无过于引用彭祖的先例，但彭祖又怎样呢？“八百年内享升平，歌暇豫，轩眉蹙腹，开口而笑者，固无几也”。这一通牢骚又引起了吕留良的一大段议论。